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第734期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杨晓晖 视觉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15

今日的华师大一村依然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。略显狭窄的甬道两边,当年植下的树木密可蔽日。今年90整的翻译家智量先生住在四楼,没有电梯,每日上上下下要走个两三次。虽然下楼时他拄着拐杖,但高高的个子身板依旧挺直,步伐不比年轻人慢。

41平方米的旧公寓,一间书房,一间卧室。逼仄的空间和陈旧的摆设,因浓浓的书卷气反让人觉得温暖安宁。靠近窗口的墙上挂着屠格涅夫的肖像和名句:“你想要幸福吗?先得学会受苦。(智量译)”

1 一本开启人生的书籍

屠格涅夫是智量先生最喜爱的俄国作家之一。他翻译了前者的两部长篇小说《贵族之家》和《前夜》,赞同前者将悲观和忧伤深埋在对于纯美、纯艺术的追求中的理念。但普希金和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无疑对智量先生一生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。

王智量先生,笔名智量。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“资深翻译家”称号,精通英语、俄语,并旁涉法、德、日语,集理论批评、创作、翻译于一身。他的翻译风格原汁原味,被奉为直译派的代表。他翻译了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(译林版)《上尉的女儿》《贵族之家》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等30余部名著。作为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,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得以通过他的文字走进那些伟大的作品。

谈话中,智量先生兴奋地和我们讲解起“奥涅金诗节”的押韵规律“ababccdddefef”,每一句中文翻译押韵都符合俄语的音角,令作品具有一种非常工整、和谐、严密的艺术形式。当这位九十岁的老者用能媲美朗诵者的华美嗓子诵读,诗句接连不断优美而舒展地吐出,如同均匀起伏,而又暗藏汹涌的伏尔加河宽阔汹涌,滚滚向前。著作等身尚不是他丰沛的生命与追求纯粹的精神的全部。他一生经历过各种风波,亦少见人性的险恶。

智量先生一九四七年考入北大法律系。1949年,北大挑了30个人到哈尔滨跟俄罗斯人学俄语,热爱俄国文学的他被选中了。在哈尔滨的八个月,原本就极具语言天赋的他进步迅速,又在朱光潜先生的帮助下换到西语系。“那时,说是西语系,其实主要就是这一班学俄语的。”本科尚未毕业,他即被任命给同届的同学授课。也是在哈尔滨,他买了原版五卷本《普希金文集》,遇到了之后贯穿一生命运伏线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

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另一个英译本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,他就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。而后,有苏联专家来北大讲学,在大礼堂内,听到动心处不能自己的智量站起来大声流利背诵起《奥涅金》,一时让所有人对这个一副书呆子样子、样貌孱弱的年轻人刮目相看。

让智量先生颇为得意的几次公开“炫技”还包括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加学术会议,一位法国女学者用法语背诵《奥涅金》,他立刻站起身来用俄语和她一起朗诵。背完后,在众人的掌声中,两人激动地拥抱着。

北大毕业后,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,在文研所所长、前辈诗人何其芳先生的提议下,智量开始试译《奥涅金》。

爱就是力排众议,不离不弃

吴南瑶



摄影 本报记者 陈灵玮

下载打开“新民”App客户端,点击右上角AR图标,扫上图,看智量先生俄语深情朗诵《奥涅金》视频

2 一段苦难岁月里的坚守

命运在1958年对智量露出了狰狞的一面,他被“增补”为右派。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,应该选择顺服,还是坚守?

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去河北农村接受改造了,文学所的墙上还贴着那幅让智量终身难忘的漫画:他躺在棺材里,抱着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棺材盖上写着“白专道路”四个字。本当走得决绝,然而临走前,何其芳匆匆的一句低语“《奥涅金》你一定要搞完喽!”让回到宿舍的智量痛哭一场后,将俄文版的《奥涅金》又塞进了行李。

“这就是我的30岁,之后我的经历可以用‘妻离子散’来形容。”先生毫不避讳地讲起前妻当年与之决裂的细节,依然是爽朗的语气,仿佛那些刻骨的伤害是他人的桥段,与他无关。

智量先生的爱情经历,亦和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现实紧密相关。因此,他的笔能与巨匠笔下的人物同命运,共呼吸,他们莫不是以爱,以孤独,以生命来雕琢每一字,每一句。

智量先生说,他曾经也很想死,就在平山县的滹沱河边,但最后,他把帽子扔进了河水。从河北又给发配到甘肃,还好尚有远在上海的家人牵挂他。兄长给他寄了路费,打电话说:“不惜一切代价你都要回来。”1960年年底,

智量终于因病侥幸回到了父母和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身边。带回的行李除了那本俄文版《奥涅金》,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废纸。那些正是在深山僻村里,从深夜到凌晨,凑着煤油灯如豆的光,他撕下糊墙纸,找来香烟盒、草纸,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、铅笔、钢笔记下的白天劳动间歌想好的诗句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全家人包括嫂嫂、儿女都帮智量先生誊写整理那些翻译手稿。

1962年年底,被“摘帽”后的北大俄语教授余振先生终于在上海和心爱的弟子重逢。看着学生攒下的译稿,师徒二人泪眼相对。拿出家藏的《四部备要》,余振先生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了,把钱塞到弟子手里。“继续翻吧,我帮你改。”余振先生说。智量至此知道自己不能放弃,也不舍得放弃。困顿的岁月,从此有了光。

和父亲和两个孩子住进兄长安置的家徒四壁的房子,在最艰难的时期,智量在黄浦江边扛过木头,打过杂,晚上回到家,粗陋的菜饭一端上桌就被两个孩子一顿狼吞虎咽吃完了,智量和父母常常相视一笑,而后就这样饿了一夜。但他仍然每天早起晚睡,偷偷翻译《奥涅金》。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。

3 一场60年的厮守

春回大地。1978年,经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努力,智量终于从一个没有单位的人破格成为了华师大教师,那一年他50岁。

1979年,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。从北大老师、文研所研究员一路急转直下变成被改造对象和做体力活的工人后,整整20年过去了,王智量重新走上大学讲台,讲俄国文学,讲《奥涅金》,并用充满激情的俄文朗读。走廊上,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,有大学生,也有进修教师、社会青年。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,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。整整一分钟,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。

2013年,华师大出版社出版了18卷的《智量文集》,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智量先生在1978年复出以后完

成的。其中的“教学编”,收入的就是1979年的讲稿。“每天只睡几个小时,4点半起床,一分钟都不浪费,就是想把那20年补回来。”智量先生笑言,吃过真正的苦后,之后所谓的苦都变成了甜。

1981年,经同事介绍,智量先生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“达吉亚娜”。吴妹娟是社科院的工程师,两人算得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。当年,译文出版社找到智量先生,想请他翻译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作品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。白天智量先生要上课,回来就对着录音机直接口译。夫人下班后,则坐在写字台前一边听录音,一边记录先生的译文,再交由先生修改订正,80万字就这样在两人的合作下完成了。

1982年,前前后后改了不下十

>>> 记者手记

一张红木书桌

1986年,智量先生在夫人的帮助下翻译的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出版了,一共收到了5000多元的稿费,当年也算是巨款。拿到稿费的第一天,两人就去淮海路上的家具店,花了1400元买下了心仪很久的一张红木书桌,“非常大,人都可以睡在上面”。智量老师笑着补充道。前两年,曾经有人想花大价钱请智量老师转让,被拒绝了。

就在这张红木桌上,他究竟做了多少事呢?好像算也算不过来。如今最令他深感遗憾的是,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《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》、德国诗人海涅的《归乡集》、叶赛宁的《抒情长诗》这三本诗集译稿再也找不到了。那些年,没有课题,没有经费,没有合同,没有约稿,“我喜欢的诗集,我就拿来翻”,他就一路顾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

“我一直相信妈妈说的,我是会遇到贵人的。”老人笑得开怀。而他口中的“贵人”包括师长、家人,还有那些在最黑暗的日子里,曾经给予他帮助的,那些同样处于最底层的善良的人们。智量先生说,“我最怕提到妈妈。她教会我太多,又为我吃了太多苦。”母亲是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生,在智量先生不过三四岁光景的时候,便牵着他的手,指着沿路的房子、树、小狗教他英语单词。然而,除了语言能力之外,影响智量先生一生的是母亲的金句:做人要凭良心,最后必能逢凶化吉。

虽然四次受到邀请,因为种种原因,智量先生一辈子没有去过俄罗斯。他一生超越物欲,从不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。但亦会路见不平一声吼,被夫人称为“爱管闲事”。他的祖父王世铨是中国近代书法家,曾经做过县长。或许亦出于血脉的传承,老年后,智量先生拿起毛笔画虾、画兰花,亦是有模有样。

“他其实就是奥涅金呀。”一旁的夫人对我们说。 吴南瑶



遍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他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“奥涅金诗节”的韵脚、韵味和节奏,在国内数个译本中,被誉为“标志性的译作”。余振先生高兴之余,说“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。”当智量先生终于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,改出了一个每行十个字、整齐押韵的译本时,余振先生已经去世了。

总是大声笑着的智量先生其实泪点很低,有时说起什么,眼眶立刻就湿了。在他的诗人气质和书生本色之中,蕴含着生和死,苦难和涅槃。

一部《奥涅金》,历经60年,智量先生为这部经典贡献了两个中文译本——自由体和古典体。他将大半生时间用来与这部经著作“长相厮守”,成为翻译界的绝响。他的身上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:博学、勤奋、坚忍、豁达。